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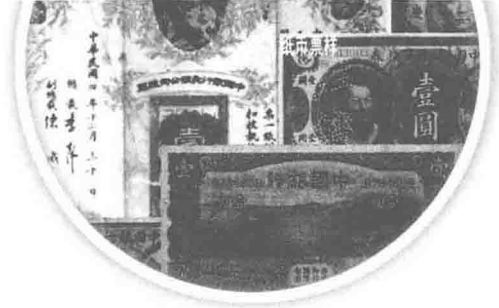


中国银行的 市场化发展研究

(1912~1937)

董昕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银行的 市场化发展研究

(1912~1937)

董昕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银行的市场化发展研究(1912~1937)/董昕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5

ISBN 978-7-5161-4358-2

I. ①中… II. ①董… III. ①中国银行—银行史—研究—1912~1937
IV. ①F832.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17020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吴丽平

责任校对 徐洪春

责任印制 李真真

出版

社址

网址

发行部

门市部

经销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6 号 (邮编 100720)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印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次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21.5

插页 2

字数 363 千字

定价 5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

“中国金融现代化进程中跳动的脉搏：
中国银行的市场化运作研究(1912 ~ 1937)”

编号 (09YJC770030)

最终成果

序 言

吴景平

中国银行有着 100 年以上历史，是华资银行业中历史最为悠久的一家。而自民初成立至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中国银行一方面为历届中央当政者所倚重，另一方面又长期作为金融市场的主导力量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中国银行始终有国家银行的名分，但其体现商股利益和愿望的独立性又难以为当政者所容忍；而在诸多商业银行看来，中国银行凭借着雄厚的资力和与政府的密切关系，是同业中当然的翘楚和领袖。正因为中国银行的历史悠久、发展演变较大、地位重要，已刊未刊史料文献庞杂，多年来，中国银行一直是中国近代金融史、经济史研究者的关注所在，相关的研究成果以《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和《中国银行行史 1912 - 1949》为代表，可以说围绕社会变迁特别是与政府关系为主要切入角度，对于 1949 年之前中国银行发展演变的基本脉络和主要史事，已经有较全面的梳理；对于该行在近代中国金融转型和市场运行方面的地位、作用，虽然相关个案性的文章较多，但缺乏有分量的专门性研究著作。正因为如此，通览董昕博士撰写的《中国银行的市场化发展研究》书稿（以下酌予简称为书稿）之后，觉得值得关注。

这是作者继完成博士学位论文《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研究》之后，花了近 6 年时间写就的书稿，凝聚了作者治学期间尤其是毕业后付出的不寻常艰辛的努力。全书以中国银行的市场化发展为主线，选取了这一发展进程中最有代表性的时段，探讨中国银行自 1912 年成立到 1937 年抗战爆发期间，该行的市场化发展特点与阶段性特征。这是非常有意义的探究。

中国的华资银行业从产生起，一般而言均取股份有限公司的形式，其业务经营即离不开市场；尤其是没有政府直接投资和控股的普通商业银

行，市场化是其不二选择。中国银行无论从资本额还是主要金融业务额来看，都位居华资银行业之首，其市场化理应毋庸置疑。然而，中国银行的商业化运作方式，却不同于一般商业银行的市场主导，而是政府主导和市场主导交互呈现。书稿作者敏锐地抓住中国银行商业化基本导向的演变，将其归纳为“从1912年至1937年间，中国银行的商业化历程经历了从政府导向转向市场导向，复回归于政府导向的一个比较完整的历史发展过程”；并且把商业化运作方式和内容视为“理解近代银行制度变迁的关键问题”，指出“银行的商业化发展也有两种途径或模式，分别是市场主导和政府主导。这也是分析近代中国银行商业化问题时可直接切入的两个角度”。

事实上，中国银行的定位，无论是北洋时期的国家银行还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政府特许银行，都不同于一般商业银行；而其官商股本构成比例，经历了北洋初期的官股为主、北洋中后期的商股化，到国民政府时期官股控股，都影响到中国银行商业化导向。对此，书稿指出了商业化推进中不同导向的不同后果：“政府导向与市场导向分别在不同层面发挥着作用。以市场导向为基准，中国银行的商业化运作努力收效明显。同时，中央政府控制力的强弱是政府导向能否占据主导地位的关键性因素，这决定着中国银行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商业化的推进必须得到中央政府的认可，而且必须在宏观经济较为稳定的条件下运行，以市场导向为主，才能充分地发挥出企业自身的活力，取得满意的成效。”

除了上述独到的研究视野和基本观点之外，目前这部书稿还体现了多方面的带创新意义的学术努力。

（一）注意征引史料来源的多样性，发掘整理和使用新的史料，为有别于已有中国银行行史著述的史事构建，打下了翔实的基础。如上海银行公会编辑发行的《银行周报》，是多种研究金融史、银行史论著中引用的主要来源，其他地区的银行专业刊物则较少被使用。本书稿的作者则根据实际需要，力求扩大征引史料的来源。如为了分析北洋时期中国银行在代兑中法实业钞票一案中的态度和作用，书稿除了多处使用了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银行公会档案、《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交通银行史料》等已刊资料集之外，《银行周报》还使用了北京银行公会主办的《银行月刊》和汉口出版的《银行杂志》。此外，近代金融史的研究者应当都知道，有关中国银行的未刊档案史料十分丰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中国银行全宗

之下便有数万案卷，上海市档案馆也有数以千计的案卷。目前书稿中除了对于《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等已刊基本资料集有较充分的运用之外，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上海市档案馆等机构所藏未刊档案史料，更有不下数百余处的征引。如书稿第六章第四节中有关中国银行对于南京国民政府借款部分，有一万余字的篇幅，是迄今为止所见最为翔实具体的专题叙述，这部分重要史事就是建立在 50 余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中国银行档案史料的基础之上的。

（二）整体上考察中国银行经营重心的转移和营业方针的调整。这也是书稿的重点内容所在。无论作为北洋时期的国家银行还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政府特许银行，中国银行在特权、资力、业务范围、市场份额等方面，都有着一般商业银行无法企及的优势，来自政府方面的扶持也是一般商业不敢奢望的。然而，中国银行却不愿意、不甘心失却市场化选择的权利，力图将经营重心转移到工商经济，把营业方针从“服务政府财政”调整为“服务公众，改进国民生活”，这究竟是什么原因使然呢？仔细阅读这部书稿，个中的原因便大白于天下。以北洋时期为例，中国银行与同样有着国家银行名分的交通银行，业务经营不仅没有面向市场和社会的自主权，反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为政府财政所“绑架”，无法正常开展业务经营；甚至到了北洋中后期中交两行在商股实际所占股额已经超出甚至远远多于官股的情况下，商股的基本权益和主张仍然得不到尊重，徒具股份制公司之表，实际经营管理不时受到政府的操纵甚至直接控制之下。尤其是 1916 年和 1921 年的两次挤兑、停兑，不仅使该两行的信誉受到重挫，也使得整个本国新式银行业的现代化进程出现反复。只是因为北洋时期政局动荡，政府财政破产、无法继续控制金融业，商股主导下的中交两行才得以实现经营重心的转移和营业方针的调整。按照书稿的说法，就是“在市场化发展道路上，中国银行的资金来源与营运方式已基本转移到商业银行的发展道路上来”。嗣后虽然来自南京国民政府的掌控压力远大于北洋时期，中国银行甚至不惜以放弃发行权来力争市场化发展的权利，这一时期中国银行的主要负责人张嘉璈最终不得不离开该行，即便其市场化发展处于政府主导之下，然而已经确立的经营重心和营业方针却难以撼动了。

（三）注重比较的方法。书稿对于中国银行在梳理发行、存放款、汇兑等主要业务方面的变迁，对中国银行在各时段的市场化发展程度进行比

较，力图揭示其原因。以发行为例，书稿把中国银行发行业务的阶段性的变化分为四个时期，即：1912年至1916年的奠定基础时期、1917年至1928年10月南迁改组前的巩固发展时期、1928年11月至1935年11月法币政策实行前的稳定发展时期、1935年11月至1942年6月四行专业化时为止的接收增发时期。“从整体上看，在第一、第二和第四个时期，中国银行对于发行业务的推进持较为积极的态度；但在第三个时期中，则对发行总额较为控制，这是与中国银行的性质变迁和业务发展倾向相适应的。”还对导致阶段性的原因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指出北洋时期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区别、实施法币政策前和之后的区别。除了不同时段比较，基于中国银行的多项业务都是以各分行及所属下级机构为主体进行的，书稿还注意进行代表性分行及所属存款、储蓄等业务的比较；基于中国银行同一业务往往有较多客户的情况，书稿中还有对于不同客户的业务情况的比较，如对于某一时期放款业务的分析，通常先列出对中央政府财政部放款、地方财政厅放款、同业放款和其他放款的比较；然后进一步细分为商业、工业、公用事业、同业、团体、机关、个人、农业、交通事业等方面所占份额的比较。如果说，以上几方面的比较都属于中国银行内部的比较的话，书稿中还有多处属于中国银行与其他银行在主要业务方面的比较，包括北洋时期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的比较、国民政府时期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政府银行之间的比较、各时期中国银行与其他代表性商业银行之间的比较。正是在多视角、多维度的比较视野下，各历史阶段中国银行的市场化发展进程得以全方位的揭示和呈现。

关于民国时期中国银行的市场化发展，还有不少问题有待更深入的研究。如对于中国银行市场化发展的考察，现在书稿对于业务经营谈得较多，而对于相应的经营管理和人事管理涉及偏少；较多关注主要业务的营业，而对于经营中的成本控制和盈利情况过于简单。另外，对于中国银行在市场化问题上理念，其代表性人物的观点主张如何，在股东大会、董事会等权力机构的决议中有否体现，最好有专门的说明。至于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银行的市场化发展进程是否发生嬗变或中止，也需要有专门的研究。希望这部书稿出版后，董昕博士能够在金融史、银行史的研究中继续努力，奉献出新的更好的成果。

目 录

导语:中国银行市场化问题的提出	(1)
一 本书的选题与主要观点	(1)
二 本书的理论体系与主要框架	(3)
三 已有研究成果综述	(7)

上编

市场主导下的中国银行市场化发展之路

第一章 利之所趋:业务发展的措施和经营重心的转移	(13)
第一节 发钞业务的演进	(14)
第二节 存放汇兑业务的演进	(27)
第三节 经营重心的转移	(66)
第二章 变中应对:对于突发事件、规制改动和时局变动的处置	(73)
第一节 对金融风潮的应对	(74)
第二节 对业务变迁与行务的规划	(94)
第三节 机构的设置与发展	(106)
第四节 对时局变动的应对	(113)
第三章 业内核心:作为华资银行业核心的凝聚力发挥	(130)
第一节 业内核心地位的确立与变迁	(131)
第二节 业内核心地位作用的发挥	(149)
上编结语	(170)

下编

政府主导下的中国银行市场化发展之路

第四章 孰重孰轻:中国银行官商股份变化与性质变迁	(177)
--------------------------------	-------

第一节 中国银行的官商股份变化	(177)
第二节 中国银行的管理体制变迁	(185)
第三节 活力与制度:对于股份与体制的考察	(189)
第五章 合分之间:中国银行与政府关系的演变	(195)
第一节 中国银行与北洋政府关系的演变	(195)
第二节 中国银行与国民政府关系的演变	(218)
第六章 利权之争:政府相关业务发展的利与弊	(246)
第一节 金库业务	(247)
第二节 税收业务	(261)
第三节 币制相关业务	(269)
第四节 财政性的发行与借款活动	(284)
下编结语	(309)
 结语 中国银行的市场化发展道路评析	 (313)

导语:中国银行市场化问题的提出

民国时期,中国银行的行史是丰富多彩的。中国银行既经历过中央银行时期的雄心勃勃与财政困惑,也经历过专业银行时期的蓬勃发展与强权劫夺。以中国银行的丰富行史为研究对象,可以进一步了解中国近代金融史的发展,也可借以总结近代金融体制变迁中的特征与经验。

一 本书的选题与主要观点

笔者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研究(1912—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选题的出发点有两点:一是能够准确把握研究对象的内涵和外延,以便收集资料 and 安排结构;二是资料比较集中,能够突出研究对象的特点。在多方面因素的综合考虑之下,笔者选择了以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为研究对象,分析该行在行务与业务上的发展变迁历程。

在撰写研究综述的过程中,笔者对历年关于新中国成立前中国银行的行史研究均做了梳理。除已出版的《中国银行行史(1912—1949)》外,有两篇学位论文引起了笔者的关注,一篇是邓先宏的论文《中国银行与北洋政府的关系》,^①另一篇是尧秋根的论文《制约与创新:近代中国银行市场化(1905—1949)》。^②这两篇论文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的博士学位论文,以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银行行史为研究对象,史料翔实,论据充分。邓文的研究时段为北洋时期,认为当时中国银行与

^① 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刊》第11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77—380页。

^② 尧秋根:《制约与创新:近代中国银行市场化》,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3年。

北洋政府存在着相互依存和相互摩擦的矛盾，双方的关系可分有三个阶段，即相互依赖、反控制与干预的斗争、分道扬镳三个时期。在双方关系的变化过程中，中国银行的商办化倾向逐渐加强，与北洋政府的关系也逐渐疏远。尧文的研究时段横跨整个民国史，从政府的制约与银行的创新两方面来分析银行与中央政府的关系，认为在近代特定的社会环境下，中国银行的商业化经历着制约与创新的双重引导，即以政府主导的商业化为其主要特征。从总体上衡量，近代的中国银行经历了一个制约大于创新，创新无法完全突破制约的商业化过程，中国银行的商业化创新是在有限的空间和范围内进行的。^① 对于上两文的研究目标与结论，放眼于中华民国史的研究范畴中，是可以得以深刻理解的。但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周期，却与上两文的研究时段均不相同。

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周期，从经济发展的中长期波动理论来考察，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中国经济经历了两个完整的经济周期，从1936年开始的第三个经济周期被日本侵华战争打断，至1949年为特殊的战时经济时期。^② 即在中国近代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只有约50年的时间处于正常发展的阶段中，即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终止。从1914年至1936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二个较为完整的阶段。结合中国银行成立与发展的历史，本书选择的主体研究时段上自1912年中国银行成立时始，下至1937年，以银行市场化问题为研究对象，探讨中国银行在研究时段内的市场化发展特点与阶段性特征。

市场化问题的研究，集中了近代化或现代化发展中的诸多内容。而金融的现代化，是先进的金融理念与行为方式对于传统的突破和重新融合。本书将结合史实，重新分析与评价中国银行的商业化努力，对其绩效作出评析，提出新的标准与新的观点。其主要观点包括：

其一，就内部努力而言，中国银行的商业化运营发展依托股份有限公司的形式和广大商股股东的支持，在某些时段内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① 尧秋根：《制约与创新：近代中国银行商业化（1905—1949）》，第5页。

^② 刘佛丁、王玉茹、于建玮：《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37页。经济周期一般而言，是指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周期性出现的经济扩张与经济紧缩交替更迭循环往复的一种现象。在实际应用和分析中，每个周期一般又分为四个阶段：经济扩张、紧缩、危机、复苏。每个阶段之间，通常研究经济增长是否偏离一条确定的轨迹波动，是否存在上升、下降，以及波动幅度的大小差异。

中国银行在市场化的过程中既借鉴现代银行学理论的基础与总分行管理制度，又结合中国在特定时段中的国情与商情，进行制度创新、管理创新与业务创新，颇收实效。这也是金融机构在扩展业务时应吸取的经验。

其二，就外部导向来看，政府导向与市场导向分别在不同层面发挥着作用。以市场导向为基准，中国银行的市场化运作努力收效明显。同时，中央政府控制力的强弱是政府导向能否占据主导地位的关键性因素，这决定着中国银行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市场化的推进必须得到中央政府的认可，而且必须在宏观经济较为稳定的条件下运行，以市场导向为主，才能充分地发挥出企业自身的活力，取得满意的成效。

其三，分阶段来看，北洋政府时期，中国银行的市场化程度较低，主要依靠各地分行的自主经营来抵消经济环境的动荡不安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国民政府前期，中国银行的市场化程度较高，专业化改组后参照国际汇兑银行和大型商业银行的模式拓展机构和业务。

二 本书的理论体系与主要框架

经济史是历史学与经济学的交叉学科。因不同的研究者在相关领域内各有所长，有的侧重于收集史料，以历史学的理论和眼光来研究经济的变迁；有的侧重于以经济学的方法来分析史实，考察不同时段社会经济环境变迁的特点与趋势。中国近代经济史是在一种西方势力强行侵入而中国传统的封建集权政治继续起作用的复杂背景下展开的，对新的经济模式的发展有很多制约因素。由于新制度经济学注重研究市场运作中的各种摩擦因素，以及制度同交权、交易成本、效率之间的关系，因此对研究中国近代转型社会是比较有借鉴意义的。^①

诺思将制度分为三个层面：第一，以规则和条令的形式建立一套行为约束机制；第二，设计一套发现违反和保证遵守规则和条令的程序；第三，明确一套能降低交易费用的道德与伦理行为规范。^② 在整个制度

^① 杜恂诚：《金融制度变迁史的中外比较》，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导论第3页。

^② 道格拉斯·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18页。

体系中，制度结构的总体均衡取决于各项制度安排的相互依存。当各项制度之间的相互依存性发生变迁，某项制度安排或整个制度结构就会发生更改，即发生了制度变迁。

制度是在不断变迁之中的。制度变迁可分为两种类型，即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前者指一群（个）人在响应由制度不均衡引致的获利机会时所进行的自发性变迁，而后者多指的是由政府法令引起的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是一种内在的制度变迁，而强制性制度变迁则是一种外在的制度变迁。制度变迁取决于现存的制度结构，是从现存结构的某一项安排的变迁开始的，然后逐渐向其他安排延伸，这也被称为“路径依赖”。在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特别是中国近代金融制度的发展变迁中，这两种制度变迁类型交替发挥作用，是一个明显的特征。

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指以市场力量为主导的制度变迁，但它并不绝对地排斥政府的作用。强制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由政府主导并通过法令引起的变迁。在经济转轨时期发生的制度变迁的主要特征，就是以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主，以市场诱致性变迁为辅。自1897年第一家新式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出现后，华资银行业由于市场的扩大而飞速发展。市场主导或政府主导下的制度变迁也交替在中国近代金融史舞台的不同时段上发挥着作用。

中国近代金融制度的变迁经历过两种截然不同的制度形态：在晚清及北洋政府时期，金融业呈自由市场制度形态；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经过七八年的过渡，金融业呈政府垄断制度形态。因此，研究政府的作用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成败得失，“近代中国是一个难得的好材料”。^①“市场化”的运作方式与内容是理解近代银行制度变迁的关键问题。银行的市场化发展也有两种途径或模式，分别是市场主导和政府主导。这也是分析近代中国银行市场化问题时可直接切入的两个角度。

“市场化”指的是，市场机制在一个经济体系中以资源配置发挥的作用持续地增大，经济对市场机制的依赖程度不断地加深和增强，市场机制从逐步产生、发展到成熟，效益达到最大化的演变过程。市场化最显著的特点是，任何一个实现资源配置的行动，从政府与其他经济当事

① 杜恂诚：《金融制度变迁史的中外比较》，导论第29页。

人之间的命令—服从关系，转变为平等人之间的自愿交易。从微观层面来看，这意味着任何一种产品或要素的交易的集中从政府管制转变为市场协调；从宏观层面来看，这意味着在全社会有更多的资源配置活动从政府支配转变为在市场制度中实现。经济市场化要求金融必须市场化。分析近代华资银行业走向市场化的历程，探索其中的曲折原委和典型案例，可以得到很多启迪。

市场主导的市场化就是银行主要以市场的变化为依据，调节自身的经济行为，以适应市场竞争并提高经济效益的种种经济活动。市场机制具有自发性、外部性等缺陷，甚至会出现市场失灵的情况，容易引起政府的干预和调节。市场机制充分地要在近代银行体系中正常发挥作用，要有一系列的先决条件，如每家银行都拥有完全的市场信息；竞争是充分的和自由的，不存在垄断；银行的经济行为不产生外部效应等。

政府主导的市场化就是由政府作为主要出资人，以国有企业的形式经营金融机构，银行的大部分经济活动主要是在政府的控制和疏导下完成，政府在银行的内部改革与经济运行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政府主导的倾向是控制银行，压制银行的民营化与发展国家资本。

银行的市场化是指在竞争的基础上，银行经营以市场为导向，充分发挥市场竞争机制的积极作用，根据市场需要开展各项工作，增加银行活力，提高银行的经济效率的长期过程。而银行市场化包括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银行本身的市场化倾向；二是政府采取的有利于银行市场化的措施。在近代中国，“银行和财政的关系最为密切，财政对银行的依存性和银行对财政的从属性，比任何资本主义国家更为严重”。^①这也决定了在研究近代中国银行市场化的问题时，要更加注意厘清市场导向与政府导向的作用与结果。

根据上述理论及分析，在研究中国银行在近代的商业化问题时（主要是民国时期的中前期），本书的篇章结构设计分为上下两编，共六章，具体内容如下：

上编 市场主导下的中国银行市场化发展之路

（一）利之所趋：业务发展的措施和经营重心的转移

中国银行一直经营着商业银行的业务。为拓展发行及存放汇兑等各

^① 张郁兰：《中国银行业发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页。

项业务，中国银行在机构设置和业务创新方面施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是为利之所趋。因与政府关系密切，中国银行又不可避免地要承购各种公债、库券及为政府垫款，虽有厚利可图，但与中国银行的努力发展方向不符；中国银行一直注重与工商业的联系，尽力收束前述业务，是为利之所不趋。

（二）变中应对：对于突发事件、规制改动和时局变动的处置

对突发事件的应对，如对停兑事件和白银风潮的处理；对规制改动的应对如国民政府征收发行税时，中行与其他发行行要求减半的努力；对时局变动的应对如随政府南迁及在专业化无法实现时的对策，等等。这些变中应对的不变基点在于如何维护中行本身的利益。

（三）业内核心：作为华资银行业核心的凝聚力发挥

中国银行成为业内核心可从三个层面来阐释：其一，帮助华资银行建立和发展；第二，通过领券制度扩充信用，领用行庄也借以扩充资力；第三，许多华资银行亦对中行投资入股。这些互动使中国银行无可争议地成为业内核心。中国银行则以此为契机，团结华资银行业，提高对外竞争力，稳定社会经济。

下编 政府主导下的中国银行市场化发展之路

（一）孰重孰轻：中国银行官商股份变化与性质变迁

就性质而言，中国银行是北洋政府时期的中央银行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专业银行。但在不同时段中，中国银行的发展方向与其性质并不一致，这集中体现在官股与商股增减的变迁上，并分析其变化的原因，探讨这些变化是如何在则例中、在业务上体现出来的。

（二）合分之间：中国银行与政府关系的演变

中国银行一直是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国家银行，拥有货币发行和代理金库等特权，但中行与中央政府间的关系却经历了一个合而分之，复又相合的过程，前者是主动的，后者则是被动的。这与政府的控制力、领导者的经营理念都有关系。

（三）利权之争：政府相关业务发展的利与弊

与政府相关的业务包括发行权、代理金库、政府借款、承销公债等。中国银行这些相关业务的发展对其本身的市场化努力而言是利弊并存的，既通过拥有发行权、承销公债等获得了丰厚的利润，也因政府借款被占用了大量的资金。最终，中国银行选择了一条减少政府相关业务

的商业银行发展之路。

结语：中国银行的市场化发展道路评析

考察中国银行的历史，在近代社会经济能够较为平衡的发展时段，从1912年至1937年，中国银行的市场化历程经历了从政府导向转向市场导向，复回归于政府导向的一个比较完整的历史发展过程。本书将着重分析其市场化过程的不同导向的作用与取得的绩效。

此外，在现在的商业银行体制的变迁过程中，银行市场化进程就是要尽快地从政府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转变，这也反映了市场化改革的大过程。^① 本书也希望以研究对象的发展经历为商业银行的体制改革提供一些许借鉴。

三 已有研究成果综述

对于新中国成立前中国银行行史的研究成果，笔者在《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研究（1912—1937）》一书的序言部分已有详述。^② 因该书是于2009年出版的，笔者补述近年来关于中行行史的研究成果。

除已出版的行史与资料集外，近数年来暂无关于中国银行行史研究的学术性著作问世。在博硕士学位论文中，有一篇以民国时期的中国银行为研究对象，即林文通的硕士论文《中国银行网点建设研究（1912—1937）》，^③ 较有新意。林文认为，自1912年建行至1937年抗战爆发时止，中国银行经历了创立、奠定行基和专业化发展三个阶段，在不同阶段的网点建设与网点布局各有千秋，具有鲜明的特征。该文根据中国银行网点建设的发展情况，结合个案，探讨了影响中行网点建设变化的社会、政治、经济、社会、区位等因素。

笔者曾将研究民国时期中国银行历史的论文根据内容归纳出几个热点问题：1. 中国银行的成立、与政府的关系及历次改组；2. 1916年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抗拒北洋政府停兑令事件；3. 货币的发行；4. 各地中

① 参见汪敬虞《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开展》，经济管理出版社2007年版。

② 参见董昕《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研究（1912—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序言第1—13页。

③ 林文通：《中国银行网点建设研究（1912—1937）》，硕士论文，东华大学，2009年，指导教师为李一翔。